

第二章 《藝文類聚》之編者及其內容體例

第一節 主纂歐陽詢之生平與其時代背景

歐陽詢（西元 557 年～西元 641 年），卒於，字信本，潭州臨湘人（今湖南省長沙市）。其出生時，正是南朝陳開國時期，祖父歐陽頴地位顯赫，曾任大司空，詢父歐陽紇為廣州（今廣東省廣州市）刺史，以謀逆之罪遭誅。詢父至交尚書令江總收養了歐陽詢，並且教授歐陽詢讀書。歐陽詢雖其貌不揚，曾被同僚笑稱：「聳脖成山字，埋肩畏出頭。誰言麟閣上，畫此一彌猴。」但歐陽詢憑藉著其聰明才智，很快的便博通經史。

時詢三十三歲，陳朝被隋取而代之，詢北上長安，開始其仕官生涯，頗受重用，曾任太常博士。隋煬帝下令楊素重修《魏書》，歐陽詢即曾參與過修書的工程，但因楊素去世而未完成。當時的隋朝官員李淵與歐陽詢有深厚交情，引詢為幕府賓客。

武德元年唐朝建立，時詢已是耳順之老朽，但仍受高祖李淵之重用，位至給事中。武德五年，高祖下令編纂《藝文類聚》，由歐陽詢擔任編輯大任，參與工作者有秘書丞令狐德棻、侍中陳叔達、太子詹事裴矩、詹事府主簿趙弘智、齊王文學袁朗等十多人。武德七年完成此浩大工程，上奏高祖，刺帛二百。貞觀元年，唐太宗任其為太子率更令、弘文館學士。歐陽詢於貞觀十五年辭世，享年八十五。事蹟具《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·列傳第一百三十九上·儒學上》。

第二節 《藝文類聚》之纂修及其內容體例

一、《藝文類聚》之纂修

《藝文類聚》是唐代初年由高祖李淵下令編修，在唐朝政權確立之後，高祖李淵便採取了許多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措施，爲了要彰顯唐朝文治盛況，於是便有了大規模官修群書之舉，在高祖下詔修《藝文類聚》的那年，同時詔修唐前歷代史，而編修《類聚》的文人中，也有不少被任命兼修史書的工作，例如歐陽詢修《陳史》，陳叔達、令狐德棻修《周史》，裴矩修《齊史》。由此可說明這些參加編修《類聚》的文人，都是當時文壇上的一時之選。而且由於他們兼修史書工作，

對充分的把握修撰類書的原始資料，也多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，正因為如此，《類聚》之編修工作，才能夠完成得非常迅速。

《藝文類聚》的完成，前後共費時三年，根據《唐書卷一八九·儒學上·歐陽詢傳》和《唐會要》記載，《藝文類聚》是在高祖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奏上。現在書前所載序文，正確的結銜應該署「給事中歐陽詢」的，可是後人爲紀念他對國家的功勞，乃依據唐太宗李世民所賜的官職和爵號，而更改結銜署「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」。

二、《藝文類聚》之內容

《藝文類聚》共分四十六部，每部各有子目，全書共有七百二十七子目，約百餘萬言。所引用的古代典籍達一千四百三十一種之多，收集的文獻資料，包括從自然科學的天文、氣象、歷法、地形、生物，到應用科學的農業、工業、營造、器用，以及人類社會的政治、經濟、倫理、宗教、文字、藝術、歷史、文物和文化、教育等各種科學的知識，比較全面的反映了當時的科學文化發展的水準和成就，可是從《類聚》引用書目中，大略分析以後，發現這些引用的古代典籍，現在還保存著的，至多不過百分之十而已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已失傳。而在僅存的百分之十中，因《藝文類聚》所徵引的都是唐前古本，可以用來和今本互校，訂正訛誤，因此歷代的輯佚校勘名家，仍將此書視爲珍貴無比，紛紛引它作爲校勘、輯佚古籍的藍本。遠在宋代，周大必、彭叔夏校《文苑英華》，就已利用《藝文類聚》；晚明以下馮惟訥輯《詩紀》、梅鼎祚輯《文紀》、張溥輯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；迨清代的嚴可均輯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，其汲取《藝文類聚》的資料之多，清代的校勘、輯佚學者治理先秦、兩漢迄南北朝古籍，就更廣泛的運用這部類書而多能深切理解其價值。

三、《藝文類聚》之編輯體例及功能

(一)「事文兼具」的新體例

《藝文類聚》序中所云：「《流別》、《文選》，專取其文；《皇覽》、《遍略》，

直書其事。」¹即在《藝文類聚》之前，我國資料彙編性的圖籍，以「文」、「事」主題分為兩大類。以文章為主的，稱為總集；以隸事為主的，稱為類書，正如歐陽詢序文所言，其缺點是「文義既殊，尋檢難一」，造成讀者查檢的不便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《藝文類聚》突破舊體例的束縛，採用「金箱玉印，比類相從……其有事出於文者，便不破之為事。故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」²的新方法。將所輯錄的材料分為「事」、「文」兩大類，在每個條目下，先羅列經、史、子類圖書有關事物的記載，後附有關的詩、賦、頌、贊、令、書、表、志、箴之屬，即集類的作品。如《類聚卷四五·職官部一·總載官職》條下，先收經部的《尚書》、《禮記》等，接著收史部的《漢書》、《東觀漢記》、《漢舊儀》等，以上各書屬事的部分；接著載集部的〈魏應璩雜詩〉。繼收〈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〉、〈晉張子並楊四公頌〉、〈後漢班固公孫弘贊〉，以上屬文的部分。

《藝文類聚》將「事」與「文」合而為一的方法，它改善了以往類書偏重類事，不重採文，以及隨意摘句，不輯片段的缺點，誠如其序言所云：「俾夫覽者易為功，作者資其用。可以折衷古今，憲章墳典云爾。」³事文合一，不但豐富了它的內容，更因檢索便利而增進其實用的價值，深受學者好評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稱：「是書比類相從，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，俾覽者易為功，作者資其用，於諸類書中，體例最善。」⁴陳振孫因稱之為：「所載詩文賦頌之屬，多今世所無之文集。」高儒也說：「漢魏六朝之文，獨賴文選此書之存，不然，幾至泯沒無聞矣。」

與《藝文類聚》同代徐堅等編《初學記》，宋李昉等編《太平御覽》，謝維新《古今合璧事類備要》，祝穆《古今事文類聚》、明解縉《永樂大典》、俞安期《唐類函》，清陳夢蕾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、張英等編《淵鑑類函》等，都是依循它事文合一的體例。在〈李淵下令編藝文類聚〉一文中提到：

歐陽詢鑑於過去的類書，以詩文歸為總集，故事才為類書，翻檢實在困難。

正如歐氏所云：「文義既殊，尋檢難一。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他採取「事

¹（唐）歐陽詢撰，汪紹楹注：《藝文類聚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第一版），頁27。

²（唐）歐陽詢，汪紹楹注：《藝文類聚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第一版），頁27。

³ 同註3

⁴（清）永瑤、紀昀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二年，影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），第135冊，頁2641上。

與文兼，匯為一書」，他這個作法，對後世也影響頗大，宋人的《事文類聚》，清代的《淵鑑類函》都摹仿它。明代的《永樂大典》，清代的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實際上有採用這種體例。歐陽詢在編類書上的創新與改革是很值得讚揚的，在中國文化史上編纂類書方面，應記上一筆他在體例方面的開創之功。⁵

由此可知「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」是後世類書編輯的主要方法，藝文類聚之影響十分深遠。

（二）廣泛採用參見法

參見法本是我國目錄學的著錄方式，而《藝文類聚》是現存完整類書中最早見參見功能者。張國朝在〈《藝文類聚》的編輯技術成就及其價值〉一文中認為：

《藝文類聚》把參見引進到圖書編輯技術中來，是對圖書編輯技術的又一個重要貢獻。它把可以歸類於不同條目中的同一事物，分別在相關的條目中重複著錄，並對內容相同而輯錄的片段詳簡不一，或出處不同的事物，用「事具某部某篇」等參見方法，指導從簡略摘述參看詳細輯錄。……⁶

潘樹廣亦在〈《藝文類聚》概說〉中表示：

《類聚》在體例方面還有一個值得注意之處，那就是參見法的運用。當某項資料與兩個類目都有關係時，編者根據關係的遠近，在其中一個類目下略引該項資料，並於其下以注語指引讀者參閱另一類目下的詳細資料。⁷

類書增加參見功能的好處，是可以把原本歸類在不同類目中的同一項資料，運用「具某部某篇」、「已具某部某篇」、「事具某部某篇」等參見方法，指導讀者參看。

⁵ 〈李淵下令編《藝文類聚》〉 李捷撰 《圖書館雜誌》第三期，頁 22，1999 年。

⁶ 〈《藝文類聚》的編輯技術成就及其價值〉 張國朝撰 《圖書與情報》第四期 頁 18 1985 年。

⁷ 〈《藝文類聚》概說〉 潘樹廣撰 《辭書研究》第一輯 1981 年，頁 163。

如《類聚卷二·天部下·雨》引《列仙傳》：

赤松子者，神農時雨師也。⁸

下注：「事具仙部。」查察《類聚卷七八·靈異部上·仙道》引《列仙傳》載：

赤松子，神農時雨師。服水玉，教神農，能入火自燒。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，隨風雨上下，炎帝少女追之，亦得仙俱去，高辛時為雨師。⁹

藉由參見法，可以發現同一事件分載兩類，有兩個資料來源，卻詳略不一的敘述。又如《類聚卷八六·菓部上·桃》引《列仙傳》云：

葛由，羌人，好剋木作羊賣之。騎羊入蜀，蜀中王侯貴人追之，上綏山，皆得仙，故里諺曰：「得綏山一桃，雖不能仙，亦足以豪。」¹⁰

下注：「事具獸部。」查察《類聚卷九四·獸部中·羊》引《列仙傳》載：

葛由者，羌人。周成王時，好剋木作羊賣之。一旦騎羊而入蜀，蜀中王侯遣人追之，上綏山，山在峨眉山西南，無極，隨之者不得還，皆得仙道。山上有桃，故里諺曰：「得綏山一桃，雖不得仙，亦足以豪。」山下立祠。

11

可知加注者，均為記載較為簡略的一方，編者以之引領讀者，進一步參看較詳細資料。

參見法不僅使類書的內容更加充實，結構愈為完整。讀者可以從不同的條目中查到同一事物的材料，而且還可以使主題相似的事物，在參見體系中互相連結起來，達到揭示某一事物的整體性要求。繼《藝文類聚》之後，許多類書都採取

⁸ (唐) 歐陽詢，汪紹楹注：《藝文類聚》(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第一版)，頁27。

⁹ (唐) 歐陽詢，汪紹楹注：《藝文類聚》(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第一版)，頁1327。

¹⁰ 同註10，頁1486。

¹¹ 同註10，頁1632。

參見法體例。如《太平御覽》的「具」、《玉海》的「詳見」、《古今事文類聚》的「見某門」、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「參見」、《淵鑑類函》的「詳」等，大概同於《藝文類聚》的「事具」。

(三) 類目依照天地人事物的順序排列

《藝文類聚》在唐代初定天下時修編，在類部安排的順序上，呈現了尊王的精神。也就是一種符命祥瑞、天命歸屬的觀念，出現其部類編排之中。《藝文類聚》在〈符命部〉這一部類之後，馬上接了〈帝王部〉，好充分告訴世人歷代帝王為皇的正當性。甚而全書大類的順序安排也有別以往。戴克瑜、唐建華以為，隨著君主政治型態的穩固，天、地、人、事、物的等級區分也逐漸形成：

……認為世界的最高主宰就是天帝(天與地比較起來，天為上，地為下)，也即是上帝，君主就是這個上帝的兒子，君主對人民的統治是上帝的意志，其次才是事和物。這個思想長期地在我國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。所以一切類書也是遵循這種封建的世界觀進行分類排列的，而《藝文類聚》是現存最早的一部類書，也擺脫不了這個格調。¹²

李守素、梁松會亦云：

漢代董仲舒將儒家思想和陰陽五行加思想結合起來，……他著《春秋繁露·天地陰陽》指出：宇宙間有十種最珍貴的東西，即「十瑞」：「天、地、陰、陽、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九與人而十，天之數畢也。……畢之外謂之物，物者貴之端而不在其中，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。人下長萬物、上參天地。」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稱：「仲舒遭漢承秦無學之後，六經離析，下帷發憤，潛心大業，令後學者有所統一，為群儒者。」以其巨大影響，加之統治者的支持，從而奠定了歷代類書以天、地、人、事、名物為序的分類體系。¹³

¹² 戴克瑜、唐建華撰：《類書的沿革》（四川：四川省圖書館學會編印，1981年3月），頁27。

¹³ 〈試論類書的分類體系與分類技術〉 李守素、梁松會撰 《大學圖書館學報》第5期1989年，頁22。

自漢武帝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起，中國的統治者、士階層、廣大民眾相繼接受了儒學。《藝文類聚》即是依循漢代以降的儒家宇宙觀，將之實踐到《藝文類聚》的編纂體例，創立了歷代類書以天、地、人、事、名物為順序先例。

《藝文類聚·序》云：「……皇帝命代履其，撫茲寶運。移澆風俗易，反淳化於區中。戡亂靖人，無思不服。」¹⁴強調唐代君王是順於天命，取代隋而統治天下。是想爾後哪一個朝代不是奉天承運，所以官私類書的大類順序多依照天、地、人、事、物的順序。人們運用類書時，依循這個順序思索、查考資料，君權神授的尊王思想，也無形的深烙人們心中。

(四) 體例的教化功能

《藝文類聚》在內容的取舍方面，體現出善美的強烈傾向，乃是儒家重視以經籍潛化民心，施行教化的實踐。很注意採集正面材料，摒棄反面材料。如〈帝王部〉只輯錄歷代賢明或正常的君主，對於歷來認為是荒淫殘暴、禍國殃民和篡奪權位的統治者，如夏桀、商紂、秦始皇、王莽、隋煬帝等，一概不提。又如〈人部〉列有「聖」、「賢」、「忠」、「孝」……等目，只以很小的篇幅安排「妒」、「淫」二目。可知其重勸善而輔之以誠惡的設計。所以傅榮賢云：

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步以真為「旨」歸，它通過用心良苦的類目設定，求得一種「治心」和「教化」的審美效果。同樣，古代分類學通過對若干文獻的整序而形成的文化景觀，也帶給了人們一種與道德相聯繫的審美愉悅，這種美不再是形式美而是內涵美。美以善為其內容，善以美為其形式，二者高度統一。……而古代所謂的「善」是以儒家倫理觀念為基本取向的。因此，作為「明道之要」的古代分類學集中表現出了超越「甲乙簿錄」之上的倫理追求與倫理實現。這種倫理性，也事實上構成了古代分類學的「善」之所歸。¹⁵

這種宣善誠惡，發揚教化的功能，雖為儒家所倡導，但是歷代君王政權，卻可從

¹⁴ (唐) 歐陽詢，汪紹楹注：《藝文類聚》(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第一版)，頁27。

¹⁵ 傅榮賢：《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》(台北：學生書局，民國88年)，頁185。

中獲得安定的力量。故賀修銘云：

中國傳統文化是以「求善」為目標的「倫理型」，由此產生了勸善懲惡，有害無害的價值判斷觀念。類書內容的取捨、取材範圍的擬定正是以「求善」為座右銘的，……「求善」也就是成為類書內容取捨的標準和原則。而「求善」正是以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為出發點的。¹⁶

對一部官修類書而言，當然無法避免這項任務。後世類書基本上也遵循著這樣的一種精神編輯材料。



¹⁶ 〈興盛與歸宿——試論類書的政治文化背景〉 賀修銘撰 《圖書館界》(廣西)第三期 1988年，頁50。